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北京第四次应用伦理学论坛会议纪要 [Beijing 4th Applied Ethics Forum Meeting Note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4 12:36:4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356

徐昌文 王青原 整理：北京第四次应用伦理学论坛会议纪要

徐昌文 王青原 整理

2004年8月27日，第四次北京应用伦理学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举行。晏辉博士就经济伦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做了主旨发言，主评人孙春晨博士对晏辉博士的报告做了回应。随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经济伦理学的有关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晏辉博士：我主要谈经济伦理学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前提批判。

经济伦理学产生和发展源自于人类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和人类思维范式的转变这两大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人类活动由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即分离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三大领域，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三个必要活动领域。经济活动解决的是生活资料的来源问题，政治活动追求的是正义问题，文化活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精神和意义支持。这三大活动就有三大意义，正好对应的就是效益、正义和自由，这三个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最必要的活动。

这三种活动好像一个正三角形，产生了社会发展的三种模型，第一种模型是处在前市场经济时期，政治在上，经济和文化在下，由政治来整合经济和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和文化要发展，必须取得政治的认可，计划经济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它把社会的稳定放到了至上的地位，而牺牲了效益和自由。第二种模型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经济在上，政治和文化在下，这种状态我把它叫相对分离状态，经济和文化要按照它内部的规则运转起来，这时政治对经济和文化的限制要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经济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就导致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依赖性。经济依赖性是有边界的，一旦超出了这个边界，就要诉诸于政治制度和伦理来调节，这样政治和伦理就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第三种模型是文化在上，经济和政治在下，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这时社会就不再是政治高高在上的立体社会结构了，而是一个网络式的平面结构。

从这三个模型来看，第一种模型是政治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第二种模型是资本和技术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第三种模型是知识和人才成为了社会运转的核心。第三种模型是社会最理想的状态。这三种模型依次形成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经济的依赖和人对社会的依赖的人类发展的三种形态。这三种模型充分地验证了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发展的三种形态。由这三种模型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社会发展到由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时经济伦理学就自然地产生出来了，我把这称之为经济伦理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前提我认为就是思维方式问题。应用伦理学的产生并不是概念的转化，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的就是学术研究；第二层次是执政者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三层次就是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有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伦理学的道路，基本上属于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伦理学概念去解释已经、正在或将要发生的经济现象，用落后的或不能解释问题的概念去解释经济问题，简直是站在门外说门内的话，站在学科外面说学科内的话。第二条道路是经济学家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伦理问题，他们对伦理学抱着鄙视的态度，甚至认为伦理学是虚无主义，认为经济依赖性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把经济帝国主义甚至延伸到了生活领

域。第三条道路是一些社会机构为经济伦理学做了大量工作，做了一些调查，掌握许多现实的一手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我认为我们目前应当深入到经济活动内部去，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清楚经济伦理学存在什么问题。

第三、经济伦理学该研究什么。

经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规则问题，实际上这是经济行为的伦理基础问题。在研究经济伦理学问题上我把它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作为经济活动前提的伦理问题，第二个是建立经济活动过程的伦理问题，第三个是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伦理问题，这三个环节也是动态的。

第一个环节作为经济活动前提的伦理问题就一定涉及到经济活动以外的政府的行为，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是一个首要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这也就是制度性安排，对于受益者来说是制度性优势，对非受益者来说叫做制度性缺陷。我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乃是一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乃是一种伦理理想。由于制度性优势与缺失的区别，导致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

其次就是价格问题，我国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物价部门来决定，而物价部门恰好处于公共的行为领域。制定价格的人以什么标准来制定价格呢？怎样来保证制定的公正？我觉得价格问题直接关系到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土地问题，为了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征用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这部分农民没有土地可耕种，他们的生活如何解决？把它上升到伦理高度来说就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正义观，只有把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发展放到首要位子才是真真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个环节作为经济活动过程的伦理观。这就涉及到了很具体的经济问题，我认为有三种经济主体，即个人、一般经济组织和政府。个人和一般经济组织要遵守经济行为的伦理规则，政府要对个人和企业组织负责任。因为政府占有公共资源，有机会去寻租，如何把政府的经济活动控制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环节是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伦理行为，我把它提升为对市场经济的伦理批判。使现代化发展起来的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作为动力的需要问题、二是作为环境的市场化问题、三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问题。动力问题是需要，经济学从不过问合理需要的边界在哪里？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需要。需要有三种，一是正常的需要；二是奢侈的需要；三是浪费。我们需要许多商品，要借助于货币来完成。

货币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虚拟享用的社会，产生了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对人的需要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第二是市场化，什么都市场化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就是把不应该交易的行为也按照交易的规则去对待，就很可能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物质化功利化，把终极关怀的东西也变成了物质利益。第三个是它很可能造成把人们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而用于提高人们心智力量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明显表现不足，出现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可是人们感觉不幸福。因此，对后果来说我们现在逐渐积累的恐怕是造成幸福的前提而不是幸福本身。

2003年11月17日，《北京晨报》上用幸福感概念代替GDP和消费指数对我启发很大，从这一概念可以引出：我们过分的造成了能够带来幸福前提的积累，而忽视了幸福本身怎样得来，其后果是生活世界不断丰富而意义越来越差。我们可以用许多材料来证明这一问题，人们富裕了可是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瘠了。因此，从结果来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资源的增长速度远不及人们生

活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人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过。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物质化功利化。三是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问题。这是作为结果形态的伦理。第四是怎样研究经济伦理学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摆脱学术研究宏大叙事的毛病，经济伦理学研究一是要有问题意识，从问题研究入手。二是分析与规范统一，经济伦理学不是描述出来的，而是分析出来的，从经济现象当中推导出其内部的发展逻辑，还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三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要熟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然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孙春晨博士：晏辉博士是国内较早关注经济伦理问题的学者，刚才听了他的报告，深受启发。首先，我完全同意晏辉博士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与判断，而且深有同感。现阶段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我们伦理学工作者的某些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停留在“图解式”与“标签式”阶段，即运用以往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伦理原则，来解释和评议复杂的经济生活，并据此构建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缺乏学理上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很难对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在经济伦理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问题上，晏辉博士提出的经济伦理学起自于“人类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人类伦理致思范式的转变”的观点很有见地。为什么经济伦理学在最近三四十年才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引起学界和大众的关注？这显然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生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分不开的，而对这些变化着的领域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如果仍然沿用原有的伦理思维模式来解释和说明是不够的，也是不科学的。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自然也要运用应用伦理学而不是传统伦理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研究。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这一新的伦理思维方式的基本之点是在经济生活的伦理矛盾和冲突中，通过多方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来寻求一种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都满意的伦理共识。

第三，晏辉博士在报告中对经济伦理研究内容的分析，是从经济活动自身及其表现出来的伦理关系展开的，他提出的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也许不是经济伦理的全部内容，但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国内有一些学者从生产、流通、消费、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的环节或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这并无不可。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内容大体上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伦理解释和说明，有“依经济学葫芦画经济伦理学瓢”的痕迹，没有表现出经济伦理学的独特性和它自身的魅力。晏辉博士对经济伦理学内容的阐释，我认为找到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些真问题，同时，这些内容也是经济伦理学界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第四，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法上，我赞同晏辉博士提出的观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我国目前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进展来看，“问题意识与问题研究”是更为重要和更具有建设意义的。在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的时候，与其做那些空洞的、为体系而体系的“宏大叙事”，不如认真地研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的经济伦理问题，以“问题”研究带动经济伦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也是建立中国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下面我有两个问题向晏辉博士请教。

1、你在讲到“经济伦理学该研究什么”的问题时，提出“经济伦理学的终极目的是要解决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经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何以可能的问题。”我同意经济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分配正义，也就是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晏辉博士用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一提法。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政治、文化、法律等都是公共资源，经济伦理学能够解决这些公共资源的公正分配吗？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报告中所说的公共资源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2、在谈到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时，晏辉博士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对象是“经济伦理的公共伦理形态”，包括“引导经济行为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伦理问题”和“价格的伦理问题”两方

面问题。对前者我没有异议。后者“价格的伦理问题”，的确是经济伦理学需要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判断什么样的价格体系是合伦理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价格的合伦理性？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市场自由价格存在不合伦理性的地方，那么怎样保证政府干预下的价格就一定合伦理性？我想请晏辉博士简单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伦理学研究者们在研究经济伦理过程中，要注意知识准备上的问题。目前最紧要的是经济学知识的补充。也许我们看不懂经济学著作中那些数学模型背后经济学大师们所秉持的经济学立场和思想。作为经济伦理学研究者，多读一些经济学名著，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说一些经济学的门外话，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阅读经济学著作之中，发现经济学研究的趣味和课题、不断接近伦理学自身的思想本质和内在逻辑。

卢风教授：我觉得晏辉博士的报告很有深度，是一个在经济伦理学领域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的报告，对我非常有启发，使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个是我们在研究经济伦理学时，如何理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是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我曾经把我们这个时代叫做经济时代。在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经济学必然是社会科学的老大，甚至可以讲它就是第一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解释力是最强的。像贝克尔断言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一切现象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释人文社会科学只要经济学就够了，如果还需要尊重其他学科的话，那么其他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只能服务于经济学，或者说它们处于辅助性地位。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研究经济伦理学时，我们能否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本来还是从伦理学中分出来的，在今天，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成了最重要的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美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的学问，朱光潜先生在《美学书简》中，他在定义价值时认为价值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对此我感到很惊讶，这么一个大哲学家也认为价值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当然经济学研究价值是最多的，也是最定量化的，但能否认为价值就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经济伦理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可不可以从哲学层面，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它是不能被经济学的价值所概括的，还有没有价值的某些方面完全没有被经济学触及到的东西？另外，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基本假设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例如“理性人”的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了一门强大的学问，是因为它有一套用数学模型的计算方法，它的解释力、预测力比较强。市场对激励人们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做事情寻求高效率时，总是想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来刺激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但后来证明这一套越来越不行。市场通过激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然后通过企业把他们整合起来，这样就能够产生效率。市场是否可以不仅刺激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还对人们的情感需求甚至终极关怀产生极大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的许多问题就不需要伦理学介入了，有经济学就足够了。原来经济学是从伦理学中分解出来的，是从属于伦理学的，现在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伦理学是一门更古老的学问，是一门更规范的学问，经济学还处于生长之中，但是在我们今天经济学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晏辉博士你刚才讲到了不能用GDP来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要用幸福感来代替GDP，这好像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潮流和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授予了一个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最近也有一些非正统的经济学，如人本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的经济学的挑战。经济收入并不能代表人们对意义的追求，也不能代表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人本主义经济有没有可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如果它成为了主流，能否更好地调整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

肖巍教授：我觉得晏辉博士报告很好，他针对经济伦理学宏大叙事的研究弊病以问题研究的形式进行梳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有逻辑而且非常有深度。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福山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关系里讲，不管你经济体制是怎么创造的，你的经济体制都是起源于文化，福山提出了一个文化的范畴，而且强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80%是正确的，因为它强调了人们的理性和对私欲的追求，但是它认为没有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我想问，你强调了三种三角形的模型，那么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有那么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文

化状况怎么影响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建构和运行？包括怎样影响了经济伦理的发展？第三个问题，你提出了这三种模型，你认为理想的模型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经济伦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否最终就是解决分配公正问题？

晏辉博士：就卢风教授提出的经济学与经济帝国主义的问题，我认为实际上应当把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实际生活当中经济力量的作用两个问题区别开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可能看到了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而导致了在学科上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解释经济以及经济以外的人文现象。比如像经济学家贝克尔就用经济学来解释家庭问题，并提出了很多伦理问题。家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组织，它和其他的组织不一样，它有以下性质：第一，它具有超功利的性质；第二，人们要恋爱结婚组成家庭，往往是没有经济收益的。另外美国经济学家鲁茨写了两本书，《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和《人本主义经济学》，这两本书确实具有向西方主流经济形态提出挑战的倾向，他从近代的佩蒂到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中梳理出了经济背后的人本因素。第二个具有挑战性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就是博弈论。我认为对西方经济学某些缺陷提出伦理批判恰好不是伦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本身，这一点我们伦理学做得不够，对西方批判的观点梳理得不够。这就导致生活层面上经济行为的帝国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把这种倾向变成一种政策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制度的导向。

廖申白教授：有很多问题我都很关心，想搞清楚，想求教于各位。听了晏辉博士和孙春晨博士的报告，我有两点启发：第一点让我感到受启发的是，晏辉博士谈到人对经济的依赖性有这样的一个交往关系模式：人对人的依赖和对经济的依赖。人对经济的依赖产生的交换模式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历史点？人对经济的依赖和对人的依赖这两层关系怎样看？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关系的后面都是人和人的关系。晏辉博士所讲的文化价值的交往模式，这种模式摆脱了人对经济的依赖，这样的交往模式和经济又是一个什么关系？第二个启发是，晏辉博士走出了一条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道路，他认为应该从经济行为、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生活的前提来研究，这个前提可以理解为社会交往的更为宽广的环境，这个环境显然与政治制度有关系，也就是与公共权力系统有关系，但不仅仅是公共权力本身，他认为这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前提环节。第二个环节为经济活动过程，或者说具体的个别的经济行为过程。第三个环节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对我们社会产生的作用。它使我们生活片面化还是丰富化？它给我们提供了幸福的条件还是幸福本身？这都是更哲学化的问题。孙春晨博士的评论也给我很大启发，他区分了这两层：即研究的条件和研究方法本身是不同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经济伦理学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对社会环境的理解和知识储备，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解决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就晏辉博士谈到的第三个问题，经济伦理学应该研究什么？其核心是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的问题，对我来说目前是很难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在哪里？我想经济活动是可以使我们过好一点的生活的必要活动，人离不开经济活动。经济怎么把人联系起来？生产是通过协作和分工把人联系起来的。经济伦理学讨论最早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讨论最多的是贯穿于整个苏格兰学派、经亚当·斯密一直到近现代经济学。把经济生活和伦理联系起来的最本质的东西还是交换，交换是自愿的交换。交换的资源和公共资源是什么关系？自由主义最为强调的东西是私人自律，以经济交往本身作为纽带所涉及的资源与经济伦理学中的公共资源是什么关系？罗尔斯谈到了产生分配正义的概念，涉及到可分配的资源，可分配的资源是哪部分资源？罗尔斯讲的可分配的公共资源是社会合作系统所创造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人人皆有的、平等的。

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基本自由与作为交换关系的自由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古典经济学时代，一直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按照赞许的方式来阐述，另一种是批判的方式。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假设有其缺陷，第一个信条是私人自律的领域，第二个信条，必须是自愿的交往，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原则了，这样的两个原则还是依赖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这些环境与制度的安排是分不开的。当自由主义的

自愿性假设展示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时，这个假设就会出问题，自由主义交换原则是社会联系的必要纽带，当我们把自由交换原则展示在社会环境中，它的自愿性原则就会出现出问题。所以我们研究经济伦理学必须理解交往联系的前提，这样才能把我们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的相关环节中去理解，正如晏辉映博士所讲的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前提假设是很重要的。说到交易行为，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限性呢？我从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一点启示，交易行为是立足于具体层面的交换，具体的交换把我们作为集团的代表给忽略了，这又和制度的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状况有关。

肖群忠教授：晏辉博士的报告信息量大，收获颇多。经济伦理学研究要有新的切入点，经济伦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伦理学必须对生活进行实证研究，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实践理性部分，必须要以生活实践为研究基础。……

甘绍平研究员：现代社会人们精神贫乏原因在于意义缺失。那么经济伦理能不能解决价值问题或者说精神痛苦和价值流失问题？我自己是非常怀疑的，如果这样的话就高估了伦理学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人们是否比传统社会更加痛苦？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比原来差？如果经过调查感觉到是这样，或至少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生活失去了意义，或者说没有一个价值导向而感到痛苦的话，这个经济原因造成的吗？我觉得恐怕还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丧失。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出现了一种“解魔化”的状态，意义价值原来由宗教所研究的东西已经失去了答案，世界的意义问题就成了假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人人可以自己提出自己解答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或其他任何科学，它都无法解决人们的价值追求问题。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价值导向、价值取向和价值需求本身是多元化的，同时伦理学本身也是多元化的，所以我认为在一个个体化的时代，意义价值问题需要个体化的方法来解决。价值观念似乎是无法整合的，所以经济伦理学似乎是无法解决或直面人们的价值追求。

熊坤新教授：今天很受启发，我谈两点感受。一个是经济伦理研究的起点问题，我赞同肖群忠教授的说法，经济伦理研究起点应该源于生活，源于经济生活。只有经济生活才能产生经济伦理，人们没有生活现实就不可能发生伦理关系。比如古代在云南生活的少数民族苦聪人，他们在与外族人进行物物交换时相互不见面的，要求对方把交易物放在其指定地方，然后自己去取，这就是在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交换伦理关系。第二就是，经济伦理在学理上怎样生成的问题。比如在经济生活上人类有共性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提出人类经济伦理学，因为这是共性的问题，全人类都面对的问题。然后是洲际经济伦理学，世界各大洲由于地域、人文环境等不一样也是有区别的。还有国别、族别等经济伦理学的学理分层。如果将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深入长久地去研究的话，是否应考虑这些学理分层的问题？

王淑芹：我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经济伦理的定位问题。我们研究经济伦理所说的市场经济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是完善的还是发展的。如果没有对市场的准确界定，那么我们一概地套用经济理论来阐述我们的观点是很乏力的，这就有个定位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经济伦理的特征是什么？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来说，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和初期的市场经济形态所遭遇的经济伦理问题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什么？从我国现状来看，2003年我国市场经济报告认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经济伦理研究是在哪个时期何种形态的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带着问题来研究经济伦理学，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经济伦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细分问题，以前我们习惯于从一般的原则来论述普遍的大的道理，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相对欠缺。比如信用伦理研究，信用的概念从学理上的分歧就特别大，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不仅在经济学上遇到信用问题，在社会学上也经常遇到信用问题。我一般把它细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一般意义的信用形态，另一种是具体的信用形态，在一般信用形态中我又把这分为规则信用和契约信用，又根据各个具体生活形态的表征来作具体划分。所以我们在谈信用时一定要看它是哪一种形态的信用。我国现在缺乏的是规则信用或者说法律信用，我们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比较完

备，但关于信用的法律体系基本还没有完全出台，我们整个社会成员缺乏法律信用问题，法律信用不仅涉及到一般的个人，也涉及到政府机构。这就造成了人们守信的动力机制缺失，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信用机制？第三个问题，我们研究经济伦理学需要储备几个条件。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了解社会生活。首先要了解生活然后才能指导生活，要积极参与生活，我们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人要对经济生活领域有基本的了解。……

李萍副教授：我谈点看法。就想提一个方面的问题，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是相互交叉同时又有很多歧义的地方，但有时却是不相冲突的。企业伦理更加强调企业的规模、组织，所以它是以整体主义优先的，它会强调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这些非经济效益性的问题。经济伦理是从需要从效益从市场之中引伸出来的，它是以个体主义优先的，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因此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在这一点上是冲突的。因为企业伦理追求企业内部整合的效果、整合的利益，它不一定针对企业内单个人，这与经济伦理有不一致的地方。我想听晏辉博士对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相互关系的看法。

晏辉博士：肖群忠教授讲的伦理学要关注生活，三年前我就说过价值哲学回归生活，我是非常关注生活的，也做了一些努力。关于信用问题，在我们发展中国家或者市场经济起始阶段，政府信用要比个人信用重要。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来安排，政府信用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政策性信用，政策不具有普遍性，只对于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不利的人肯定不信它；第二就是政府行为承诺了政府不去做，政府失去了两种信用，第一是政策失信，第二是政府行为失信，它对我们整个社会而造成的损害要比个人失信造成的损害大得多。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规约政府怎样保持信用要比规约个人来得妥切。对于熊新坤教授所说的种族之间的交易叫默契交易，这在世界许多土著居民中都存在，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神圣性，这要研究……

（整理：徐昌文 王青原）

/